

六十年

LIU SHI NIAN
GUO SHI JI YAO

国事纪要

肖冬连◎著



丛书主编

郑惠

林蕴晖

外

交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 郑惠 林蕴晖

六十年

LIU SHI NIAN
GUO SHI JI YAO

国事纪要

肖冬连◎著

外

交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十年国事纪要. 外交卷 / 郑惠, 林蕴晖主编; 肖冬连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438 - 6025 - 4

I. 六… II. ①郑…②林…③肖… III. ①中国 - 现代史 - 大事记 - 1949 ~ 2009②外交史 - 大事记 - 中国 - 1949 ~ 2009
IV. K270.5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052 号

六十年国事纪要 (外交卷)

肖冬连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雄伟 章红立 黎晓慧 洪江水 杨 纯 吴向红

装 帧 设 计: 湛 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4.75

字 数: 544000

印 数: 1 - 4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025 - 4

定 价: 4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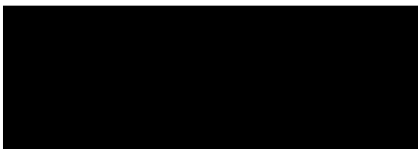
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毋庸讳言，在 1950 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奔跑的现象；幻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在经济建设上创造“大跃进”的奇迹，以在超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还试图通过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来实现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历经 30 年的艰难曲折，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逐步找到了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个崇高目标的具体途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的目标具体化、规范化了。实践表明，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30 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一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依法治国初见成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准也有了明显提高，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然，整体来说，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既定目标，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全国人民正在为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时刻，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方位回顾和总结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为此，我们约集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本达 200 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大庆的献礼。

林蕴晖

2009 年 5 月 1 日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是在 1999 年出版的《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这次增补再版，对原有书稿未作大的改动，删掉了原第十五章，增写了五章内容，叙述 1992—2008 年间中国外交新思维和重大外交事件。

本书虽为外交卷，但并不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更不愿把它写成本外交政策文献史，而是把那些对中国发展乃至国际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以纪事本末体手法，详述其来龙去脉。尤其着眼于发掘一些重大的外交内幕，即它的历史背景、互动过程、决策考虑及其实践效果，以叙为主，略加点评。为此，作者广为搜集、发微钩沉，运用了迄今所能看到并可以使用的材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写作中，以我为主，同时也用较多笔墨分析了对方。本书力求文笔流畅、文气顺达，避免了大量引述，所叙各事，皆有所据，宁缺毋滥。至于历史本身的空白，只好把遗憾留给自己，把希望寄予将来，有待更多的历史档案的披露了。

本书选择的 23 件大事，不是任意而为。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问题虽独立成篇，却都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战略来谋划。

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格局为何物？概言之，就是东西方冷战的两极体制。其中又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其间 50 年，世界风云变幻、分化组合，尤其是第三种力量的崛起，推动着世界向多极化演变，但直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轰然崩塌之前，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战后体制，没有走出冷战阴影。新中国建立肇始，正逢冷战对峙走向白热化。此后 40 余年，中国始终面对着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或者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或者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视，或者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从 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曾经有过 4 次对外战略的抉择和演变，这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反应，也是对国际环境特定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国际矛盾、借重于某种国际力量以增强自己的安全地位，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避免受制于美苏两大国的任何一方，在国际事务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雅尔塔体制最终瓦解。后冷战时期，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机遇大于挑战。中国领导人循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成功地化解了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制裁的严峻局面，通过伙伴外交和多边外交构筑跨世纪的外交格局。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以更快的步伐融入全球化，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战略谋划，是通过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不合理秩序，争取更大发言权来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和平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目标。

(一) >>>>>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一边倒”，即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其实质是联苏抗美。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作出的第一次对外战略的抉择。

从理论上讲，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对外战略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倒向美国？绝不可能。能否像印度独立后宣称的那样奉行中立政策？国内外都有这种善意的建言。然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中国与印度尽管都是新独立的落后大国，但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有重大区别。印度可以相对置身于两强争夺之外，中国不能。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把印度的中立政策视为自己的威胁，中国若奉行此道，则将有腹背受敌的可能。既不能消除来自美国的威胁，又可能引起来自苏联的猜忌。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需要寻求国际盟友，在国家重建和发展中，也需要寻求国际经济援助，在冷战对峙的环境中，这种支持和援助，唯有从苏联可以得到。

从实践上看，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结盟至少得到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安全上的，一是经济上的。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说：“中国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

还有一点也许被忽视，正是实行了“一边倒”方针，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消

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切断旧的屈辱外交的脐带方面，获得了主动权，减少了外交纠葛。而且，顺利地从苏联手里收回了东北地区属于中国的各项主权利益。倘若不是中苏结盟，苏联能否如此痛快地放弃它在东北的权益，还当另说。

中国与东欧国家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但各自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参加类似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集团。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坚持了独立自主，国防和军事指挥权更不容他人染指。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是巩固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但并不受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限制，而是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十分重视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特别是与邻近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实行区别政策，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

中国外交当时“一边倒”的同时，甚至并不排除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是想建交日期推后。然而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走上了尖锐对抗的道路，美国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中美建交变得不可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从英国开始改善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对抗，没有取得预期进展。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发出的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和解姿态，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谈是谈了，但当时的美国看不起中国，它可以与主要对手苏联讲“缓和”，而对中国的政策却十分僵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包围之势。这迫使中国在50年代后期采取了强硬的反美策略。50年代中美尖锐对抗的局面，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时所预期的。

任何结盟都不是无隙可击的。联盟内，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联盟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别、矛盾和冲突，盟国之间经常存在的“被抛弃的恐惧”和“被拖下水的恐惧”，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外政策的分歧等都可能導致联盟的削弱和决裂。

中苏结盟也难以超脱这种规律。所不同的是，中苏结盟除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点，还以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在国家关系之外还有党际关系，中苏两国领导人既是盟友又是同志。这种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以使结盟更加牢不可破，事实却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一国的国内政局和内外政策的变动，都会波及他国，因此，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共同协商和协调行动的要求，形成了一个中心、一种战略、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然而，联盟越是强求一致就越易走向瓦解。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黏合剂而是腐蚀剂，任何分歧一旦变成“主义”之争，就难以弥合了。

(二) >>>>>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了一条反对“帝、修、反”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其核心是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这是对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全面恶化作出的激烈反应。

60年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中苏分裂、中美对抗、中印交恶。毛泽东

的判断是，“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

中苏分裂已是不可挽回。中苏之间的分歧，基于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前者，在中苏结盟的主要基石——反抗美国——问题上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苏联致力于美苏缓和，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主要资本就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因而容不得不同意见。它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中国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发展核武器等主权范围内的事无理指责和遏制。中国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认识出发，坚持不妥协的反美斗争方针，认为苏联超越中国同美国搞缓和是谋求美苏共管，损害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利益，尤其对苏联企图压服中国感到屈辱，因而奋起斗争。关于后者，在世界形势、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二者发生了原则分歧。中国视苏联为“修正主义”，苏联指斥中国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事实上，意识形态之争背后都隐含着国家利益的冲突，所有源于国家利益的矛盾都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在国际共运传统中，“修正主义”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

关于 60 年代的中苏分裂，邓小平 20 多年后已作过结论。1980 年 5 月，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绝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原则。”1989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对于他自己参与其事的中苏大论战，他评价说：“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又说：“从 60 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苏分裂，本来为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追求的对外目标之一就是离间中苏关系。然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尖锐对峙的集团政治的存在，已使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十分僵化和失去选择性，中苏分裂的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注意到，但它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拉苏联来对抗中国。在它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更加不守规矩，中国是“好战的、侵略性的国家”。从遏制中国的“扩张”，防止多米诺骨牌倒塌的错误判断出发，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中美之间在印度支那方向再次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缓和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毛泽东提出“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还有其更深的理论依据。首先，他认为，在美苏之间，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一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国家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并日益发展为与美苏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这正为中国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其次，美苏两国既强又弱。美国是最强的又是最弱的，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动弹不得，并不可怕。苏联的日子也不好过。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行不通。其三，按照阶级分析法，虽然出现了“帝、修、反”反华大合唱，但真正反华的是它们的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 10%，90% 的各国人民包括美、苏、印等国人民是不反华的。因此，中国并不孤立。

在“反帝反修”战略指导下，中国在两个领域拓展了外交空间。一是加强和

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继续稳定四邻，解决了同周边国家的一些历史遗

自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战争威胁。美苏两国先后都动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念头。

(三) >>>>>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是“一条线”反霸统一战线，其实质是联美抗苏。这次战略调整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把 60 年代的“两条线”战略视为过渡性选择，那么从 50 年代的联苏抗美到 70 年代的联美抗苏，正好来了一个颠倒。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选择。

60 年代末，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衰落，迫使它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收缩政策，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减少。苏联则相反，趁美国深陷越战的机会，发动攻势，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全球争夺中渐显苏攻美守态势。对中国，自 60 年代后期起，尤其从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后，苏联不断增兵边境，陈兵百万，构成对中国的严重现实威胁，中国确认，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要改变安全环境，除加强备战外，在当时，突破口只能是缓和中美关系。

美国尼克松政府终于从中苏分歧中看到了自身利益之所在，认识到中国作为一支独立力量不可忽视，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退，同时利用中苏分歧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解冻正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

毛泽东“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反对霸权主义又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及其指导思想——关于“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是他对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而且表明他观察世界的基点已发生重大改变，意识形态考虑退居次要地位，国家利益首先是国家安全利益居于首位。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阶级分析法，联美抗苏更是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让步。

不管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是否就真的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这一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最大收获是，使中国对外关系在 70 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先，1972 年美国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20 年交恶”的局面，虽然美国在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有些犹豫，但最终由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担心和遏制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推动了美国卡特政府下决心接受中方的建交原则。中美正式建交并且随之形成了一种不是正式结盟的战略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解冻，直接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与西方有历史渊源、或接受美国援助、或受到美国压力、或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排除了障碍，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70 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从 1970 年至 1980 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 56 个猛增到 124 个，遍及全球各大洲，同时期，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排斥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的局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

选择。“一条线”反苏战略和联美抗苏，虽增加了安全系数，但无法消除中苏紧张对峙的压力，也无法改善同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整天处于临战状态，中国就无法集中力量搞建设。

中国领导人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它的对外扩张从顶峰衰落下来，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国际、国内和东欧的各种挑战。苏联已不像70年代那样富有侵略性了，美国也不像70年代那样处于守势。中国面对的苏联威胁不再如70年代那样迫在眉睫，也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一条线”联美反苏战略，不仅不必要，甚至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即不仅会继续卷入美苏冲突而失去选择自由，而且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只有保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大三角中独立一角，发挥战略平衡作用。

从全球形势看，80年代虽然在许多地区热点频出，动荡不安，但大战的危险在减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邓小平得出了一个新的论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个论断的提出，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基本估计，而且反映出中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观点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认为当今时代还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再认为世界大战注定不可避免，不再把动员世界人民准备应付战争、推动世界革命视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南北贫富悬殊，各国日益致力于发展，世界竞争越来越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和技术领域。这个认识，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中心目标从安全目标转向经济发展的目标提供了更深层的依据。

198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摩擦，苏联领导人发出和解信号，为中国着手调整战略，打破中苏僵局提供了契机。中国采取了主动，寻求缓和途径。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停止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政策的批评，确立了发展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不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从1982年下半年起，不再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同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情况下，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在80年代末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也随之基本消除，周边环境全方位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谋得了这样一种局面：避免卷入两强之争，同时与美苏保持良好关系。这是这次战略调整的重大成功。

这次调整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形象更加鲜明，中国的外交更加走向全方位。在中国的外交中，美国因素或者苏联因素都大为减少。中国宣布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定亲疏，不再“以苏画线”或“以美画线”，更加有利于同所有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以苏画线”，使一些与苏联关系友好，或不愿卷入中苏争吵的国家解除了误会。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使中国获得了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行为进行批评的更大自由。中国更加明确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不论它们的斗争锋芒指向那个霸权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展开的斗争，推动和参与“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

构建“和谐世界”，其基本理念是：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普惠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推动下，新世纪中国外交更加活跃进取、自信从容。中国政府在巩固与大国关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以区域合作组织为渠道构建和平的周边环境，以互利双赢和真诚合作为基石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实行和平发展战略，意味着中国不试图主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挑战其他大国利益，不谋求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已经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维护这个体系的正常秩序，通过参与争取更大的制定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姿态拓展多边外交，参与国际体系，中国领导人日益活跃在各种多边外交舞台。20世纪70年代，中国由于国内不稳定，也由于对联合国事务不熟悉，在联合国对一些重大问题主要限于原则表态。进入80年代后，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和活动作出了更加积极的评价，对联合国事务采取“积极主动，逐步深入”的方针。中国意识到，国际社会日益相互依存，联合国作用日益增强，地位不可替代。中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属下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出席了各种国际会议。在各项活动中，不再限于原则表态，也不一味说“不”，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出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的立场。在反对侵略、消除地区热点、推进和平进程、实现世界裁军、参加多边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等方面，中国都采取了进取的态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诚然，中国的未来发展面临各种挑战，走向真正的世界大国的道路不会一路坦途。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忽视国家力量的建设和合理投放。但是，鉴于历史经验和世界发展大势，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各国一道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是值得中国人民期许的，也是人类共处应取的方式。

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对于人类的未来，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东方之盟/1

——“一边倒”方针的缘起与中苏结盟

抗战后期，毛泽东一度希望做美苏桥梁；抗战结束，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打内战/1

内战爆发，斯大林对中共半信半疑；决战肇始，中国党明确对苏“一边倒”/4

斯大林继续奉行弹性外交；刘少奇秘密访苏寻求支持/8

毛泽东首次访苏遭冷遇；斯大林对签新约不热心/12

周恩来奉命赴苏谈判签约；毛泽东如愿而归中苏缔盟/16

第二章 “另起炉灶” /19

——中美围绕外交承认问题的早期接触与斗争

中共决心“另起炉灶”；美国等待“尘埃落定”/19

司徒寻找接触渠道；中美相互试探摸底/22

美国不承认不撤离意在施压；中国清除西方特权不容交涉/26

美英国际联合行动分歧迭见；中国坚持谈判建交主动在手/29

中国主张同西方做生意；美国策划对中国搞禁运/32

第三章

心力的较量/35

——抗美援朝中的外交内幕

美国入侵朝鲜，步步向北逼进；中国退避三舍，频频发出警告/35
唇亡齿寒，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寻求支援，周恩来秘密赴苏谈判/39
战场失利，美国谋求停火；选择时机，中国回应和谈/42
谈谈打打，以两手对两手；灵活应变，顺势打破僵局/46

第四章

打破遏制 /51

——从日内瓦到万隆

毛泽东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周恩来踏上大国外交舞台/51
周恩来首倡五项原则；中印缅共谋和平共处/56
中国总理力促亚非团结；二十九国共创万隆精神/59
积极推进睦邻友好；巧妙拆解战略包围/63

第五章

对抗与会谈 /67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

朝鲜战起，美国趁机侵占台湾；战略北移，中国被迫推迟攻台/67
中国再次显示统一决心；美蒋加紧策划共同防御/70
周恩来积极推动中美会谈；杜勒斯顽固坚持敌视中国/72
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美蒋间矛盾骤然加剧/75
联蒋抵美，挫败“一中一台”阴谋；以美制蒋，制止“反攻大陆”蠢动/80

第六章

“蜜月”中的裂痕 /84

——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

斯大林不乏友好愿望又总露大国心态；毛泽东重视中苏联盟却难拂抑郁心情/84
赫鲁晓夫上台调整对华政策；毛泽东首次感受到平等气氛/86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骤起轩然大波；中国党介入东欧事件助苏渡过难关/89
求同存异，中苏间外热内冷；维护大局，毛泽东二访苏联/94
毛泽东怒拒“联合舰队”；赫鲁晓夫狐疑炮击金门/97
赫鲁晓夫热衷美苏缓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100

第七章

“中间地带” /102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